



近代名文导读

近代 报刊文选

我国近代报刊是启蒙运动的产物，担负着传播启蒙思想、唤醒民众、为政治运动制造舆论的任务。



主编 戴逸

注译 张金涛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近代名文导读

近代报刊文选

JINDAI SAHUA JIWEN XUAN

主编 戴逸 注译 张金涛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报刊文选 / 张金涛注译. — 成都: 巴蜀书社,
2011.5

ISBN 978-7-80752-807-4

I. ①近… II. ①张… III. ①新闻—作品集—中国—
近代 IV. ①I 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71365 号

近代报刊文选

JINDAI BAOKANWENXUAN

主编 戴逸 注译 张金涛

责任编辑 陈礼

封面设计 张科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 610031)

发 行 科 028-86259422 86259423

网 址 <http://www.bsbook.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照 排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51mm×225mm

印 张 12

字 数 200 千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1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52-807-4

定 价 23.00 元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电话:028-84122206

主 编 戴 逸

副主编 杨东梁 段志洪

序 言

戴 逸 杨东梁

十四年前，我们曾编辑过一套《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共 39 册，由巴蜀书社出版。当时，我们诚邀了十几位在京的文史专家和出版社的几位高级编审组成编委会，同时，约请了数十位研究有素的作者，共同成就了此套丛书。

之所以要编辑该丛书，是要让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更多地了解一点近代中国人是如何历尽千辛万苦，探索富国强兵之路，寻求救国、救民之途的。近代中国的历史既坎坷、崎岖，又光辉、悲壮。在祖国濒临亡国灭种的危难之际，中华民族逐渐觉醒，奋起抗争。许多仁人志士高扬爱国主义旗帜，为祖国独立、民族复兴呼啸着前进，甚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青春和生命，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谱写了一曲又一曲英勇慷慨、气壮山河的乐章。

文学是时代的心声，中国近代文学就充分突出了爱国主义这个主旋律，正是这种爱国精神使中华民族得以跨过道道难关，迎来光明的前程。而今天的青年人既没有一百多年前那种举步维艰、风雨如磐的感受，也缺少较为丰富而形象的近代历史知识。阅读近代名人名家撰写的名著名篇，则可以引领他们进入那个逝去不久的时代，聆听其心声，体察其情感，品味其所思所求，从而更深刻地认知我们国家和民族所走过的那段路程。

今年，适逢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辛亥革命是 20 世纪初中国历史上一次具有深远影响和伟大意义的事件，是鸦片战争以来一次完全意

义上的民族民主革命，是我国民主革命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不仅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历史上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而且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辛亥革命为中国现代化的继续前进开辟了道路。

为了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我们与巴蜀书社商定，从《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中选出十二种，分别编成两套丛书：一套冠名为《辛亥百年——名家经典导读》，共收六种，即：《孙中山文选》、《黄兴宋教仁朱执信诗文选》、《辛亥烈士诗文选》、《章太炎诗文选》、《康有为诗文选》、《梁启超诗文选》。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他具有坚定的革命信仰，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为祖国的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献出了毕生精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革命的一生，为中国的民主革命立下了丰功伟绩。他留下了数百万字的遗著，其中不乏思想深邃、语言犀利、富有文采的名篇佳作。

黄兴、宋教仁、朱执信都是辛亥革命时期的著名人物，是革命党人中的杰出代表，也是孙中山的亲密战友。他们或因操劳革命，英年早逝；或为追求自己的政治理想，成为“为宪法流血”第一人；或极富理论才华，却惨死在军阀屠刀之下。他们的诗文都有强烈的爱国、战斗精神，但其艺术风格却不尽相同，或慷慨悲壮，或清新淳朴；或奔放，或含蓄；或犀利，或深邃，因人而异，各具特色。

我们还选收了三十多位辛亥烈士的诗文遗作，这些烈士具有坚定而高昂的革命斗志，并充满着必胜的信念。他们把生命的价值与祖国的富强、同胞的幸福紧紧联系在一起，无所畏惧，勇往直前。其诗文有的是临阵发出的誓言，有的是临刑留下的遗篇，真可谓声嘶力竭，句句铿锵，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一页。

章太炎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革命家、思想家，鲁迅说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他那篇《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尖锐地批驳了保皇派的谬论，酣畅淋漓，脍炙人口。他一生著述颇丰，涉及面广，于哲学、史学、文学、语言学诸方面均有建树。尤其是他在《民报》上发表的文章，“所向披靡，令人神旺”（鲁迅语），给后人留下了一份可贵的精神财富。他晚年虽脱离民众，渐入颓唐，但也不过是白圭之玷，瑕不掩瑜。

康有为、梁启超虽然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但在辛亥时期也是政坛和思想界的活跃人物。他们宣传保皇，反对革命，追求君主立宪，与革命派进行了激烈辩论。把康、梁的诗文收在《辛亥百年》丛书中，可以使读者更全面地了解辛亥时期涌动的不同思潮，展现出的不同政治主张。须知，正确的思想总是在同错误的思想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两者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更何况康、梁也曾经位列中国近代向西方追求真理的代表人物中，也曾一度领舆论之风骚，只不过当时代继续前进时，他们未能追上潮流，成了落伍者。

另一套丛书冠名为《强国之梦——近代名文导读》，共收录了《近代实业文选》、《近代法制文选》、《近代教育文选》、《近代报刊文选》、《近代经世文选》、《近代名人日记选》共六种。这是从文学体裁角度入手，选编近代仁人志士为追求国家富强而发出的声声呐喊。

振兴中华的有志之士围绕如何使中国转弱为强的现实问题，提出“兴实业”、“振商务”，学习西方。有人更身体力行，将“实业救国”付诸实践；近代的爱国者在寻求民族振兴的道路上，还提出了改革政治及法律制度的种种主张和方案，推动了中国法制思想和法律制度的进步；至于教育，更为历代中国人所重视，时至近代，有人甚至提出“教育为立国之本”，而资产阶级革命家则提出“革命之教育”，把中国教育思想推向了一个新阶段；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资产阶级的诞生，近代报刊也在中华大地上勃然兴起。开始是外国人在中国办报

纸，至19世纪70年代，出现了中国人自办的近代报刊；他们鼓吹以西学为师，变法图强。甲午战争后，办报形成热潮，并成为传播启蒙思想，宣传救亡图存的锐利武器。辛亥之后，革命报刊如雨后春笋，有力推动了革命运动的发展。此外，由于报刊文具有时效性、纪实性和趣味性，自然得到读者的青睐，对当时社会的思想、政治、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说到近代经世文，顾名思义则是倡导经世致用之学的产物，它宣扬进化史观和社会改革思想，标榜“采西学”，开风气，睁眼看世界，力图为纠封建末世之“时弊”而寻找一条新的出路；近代名人日记涉及近代一些著名人物的思想、活动，而且往往是亲历亲为，可作为其他史籍的佐证，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再则，有些日记出自文学名家之手，更显得细腻生动，文采斐然。

我们今天能够重新编辑这两套丛书，一是出于巴蜀书社的积极推动，二是有诸多作者的大力支持。由于巴蜀书社的编辑先生们精心策划，反复推敲；各位作者兢兢业业，认真修订，终于得以在短短两个多月时间内，将两套面目一新的丛书奉献于读者面前，这是非常令人感动的。

星移斗转，物是人非，在我们今天重温旧章之时，其中两位作者——桑咸之教授、林庆元教授却已驾鹤西去，这让我们唏嘘不已，悲痛系之！两套新版丛书的推出，也是对他们的纪念吧。

2011年4月于北京

前 言

人类自有社会以来，就有了传递信息的需要。以报刊作为一种公开的大众信息传播媒介，则出现得比较晚。我国最早的报纸当属唐代的邸报，唐人孙樵所写《读开元杂报》记载的“开元杂报”应是现今已知最早的一种邸报。邸报主要传播官方消息，属官办性质，受到严格控制，在宋代还曾实行过官报检查制度——“定本”制度，故邸报只能发挥其政治作用，在社会文化方面则没有影响。北宋末年出现民营的“小报”，内容除抄录邸报之外，也登载一些官吏任免及朝野动向，具有了新闻的性质。由于封建王朝的查禁，小报只能秘密发行，始终未能发达。直到16世纪中叶以后，明代统治者才允许民间自设报局，翻印邸报，公开发售，称之为“京报”。京报在功能上已具有某些近代报刊的特点，但仍属古代报刊的范畴。近代报刊在我国的出现，还是鸦片战争前后的事情。

我国近代报刊的发展，是受外国人在中国办报活动直接影响的结果。我国最早的近代报刊均是外国人创办的。

19世纪初，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也被带入中国，陆续出现许多外国人办的中文报刊。由于中国政府禁止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办报，这类报刊最初由外国传教士在南洋出版，然后再散发到内地。这类报刊主要宣传宗教教义，也介绍一些科学知识和世界各国情况。其中1815年出版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为最早。

由于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国门，1840年以后，外国人作为征服者，连同他们的报刊一齐涌入中国。原有的教会报刊继续发展，商业报刊也发展迅速，并逐渐取代了教会报刊。在中国各通商口岸，都有外国人办的报刊，先后大约有300家出版。19世纪70年代，外国人开始创办中文日报，影响进一步扩大。如在旧中国具有广泛影响的《申报》、《新闻报》就是在这时创刊的。外国通讯社和报社也开始派驻华记者，设立驻华机构。外报作为在中国刊行的最早的近代报刊，在中国报业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中国人从外报上了解世界各国情况，也从外报的工作实践中认识到报刊的功能，学到办报的知识和技能，使一批参加外报工作的中国人受到职业训练，为自己办报创造了条件。当中国人自办报刊出现并很快形成高潮之后，外报的作用和影响就退居次要地位了。

我国的官报与外报并存长达百余年，直到民报出现，才有国人自办的近代报刊。1873年在汉口出版的《昭文新报》是国内出版的最早的民报。较有影响的是次年由王韬创办于香港的《循环日报》。惜当时国人尚不了解报刊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意义，未被国人所见重。直到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国人反帝情绪高涨，康有为组建的强学会先后在京、沪两地出版《中外纪闻》与《强学报》，执笔撰稿者皆主张变法维新的知名人士，所写政论使国人耳目一新，才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此后又有《时务报》、《湘报》等一大批维新派报刊相继问世，中国近代报业始勃然兴起。

二

中国近代报业的兴起，是与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联系在一起的。鸦片战争以后，希望变革现实的士大夫和知识分子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新思想，开始仿效外国人的做法。由于从外国人在中国的办报活动中认识到报刊的各种社会作用，因而开始自己动手办报。

像《昭文新报》、《循环日报》均是这样办起来的。王韬的《循环日报》是最早宣传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报纸，他主张向西方学习，鼓吹变法自强，这些思想被以后的维新派政治家所承袭。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维新变法运动，这些有识之士认为中国社会百弊丛生的原因之一是消息闭塞，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开设报馆，于是办报被作为变法维新的重要手段提了出来，各地维新派纷纷创办报刊，一时办报形成热潮。

1895年8月17日，维新派办的第一家报纸《万国公报》在北京创刊，由于与广学会办的报纸重名，不久后改名为《中外纪闻》。随后维新派团体强学会成立，并在上海出版《强学报》。由于封建顽固势力的严厉镇压，强学会和两报很快即被查禁，但是他们培养和锻炼了宣传骨干，积累了办报经验，为维新派后来报刊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成为我国政党办报的先声。

1896年秋，维新派重新聚集起力量，由黄遵宪、梁启超、汪康年等人首先在上海再办《时务报》，大力宣传变法维新，受到具有维新思想的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欢迎。《时务报》因梁启超主编而风行全国，曾创当时报刊发行的最高记录，成为影响最大的维新派报刊。《时务报》的成功，使各地维新派志士大受鼓舞，纷纷办报。到戊戌政变发生前，维新党人和支持维新运动的知识分子所办的报刊就达70余种，是此前国人所办报刊的两倍多，形成近代国人办报的第一次高潮。其中较重要的是澳门《新知报》、长沙《湘学报》和《湘报》、天津《国闻报》。

《新知报》是在康有为亲自领导下于1897年2月创刊，是维新派在华南的重要舆论阵地，与《时务报》形成南北呼应的态势。由于在澳门出版，清政府无法直接干预，刊登的言论比较大胆，敢言《时务报》所不敢言者。《湘学报》于同年4月在长沙问世，唐才常任主编，

湖南许多著名维新派人士为该刊撰稿。第二年3月，梁启超、黄遵宪、谭嗣同等人在湖南成立南学会，开办时务学堂，出版《湘报》，进一步推动了湖南的维新运动。这两份报刊成为维新派在华中的重要舆论阵地。《国闻报》于1897年10月由著名启蒙思想家严复在天津创办，是维新派的北方舆论阵地。《国闻报》也是维新派的第一家日报。

这次办报高潮的特点是，地区广泛，由沿海城市向内地发展，一些中小城市也出现了国人所办的报刊；报刊品种多样，读者覆盖各个层次；报刊与学会、学堂相结合，办报人员多为当地变法维新运动的领导人，形成了一支变法维新的宣传队伍。由于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既是维新派领袖，又是著名学者，他们亲自参与办报，以及报刊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从而大大提高了报业、报人的社会地位。从此政治家办报成为我国报业的重要特点。

这次大规模的办报活动，冲破了封建统治者一贯实行的对民众言论的禁锢，使报刊成为广泛传播启蒙思想、进行救亡图存宣传教育的锐利武器，推动了变法运动，促成了变法的实现。

中国人办报的第一次高潮，伴随着维新运动的兴起而兴起，也随着维新运动的失败而告终。维新派报刊绝大多数在戊戌政变后被冠以种种罪名而遭查封或被迫停刊。虽然维新派的办报活动并未中断，但宣传中心不得不转移到国外，国人的第一次办报热潮归于沉寂。然而低潮不会持久，这一时期为报业重新发展积累了有益经验，培植了适宜生长的土壤，造就和锻炼了人才，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三

戊戌维新的失败使资产阶级维新派发生了变化，许多人开始猛醒，投身革命。一年以后兴起在中华大地上的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及其以后签订的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则使更多中国人认识到救国必须革命的道理，走上了推翻清王朝的革命道路。在这之后，中国

报业伴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走过了一段艰难的历程。

辛亥革命爆发前的十年，清王朝风雨飘摇，皇权即将崩溃，其统治力量日渐衰弱，各种政治派别都在抓紧时机，积聚力量，报业也随着政治运动的发展而日趋兴旺，出现了比维新运动时期更为广泛的思想启蒙热潮。

尽管当时各种社会力量的政治态度不同，但都认为中国必须革新政治，进行社会变革。他们对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的口号，都采取热烈欢迎的态度。因此，报刊的宗旨大多以宣传爱国、号召救亡为中心，抨击清政府丧权辱国、昏庸腐败，认为只有努力学习西方、奋起自救，才能外御列强，内倡民权，挽救中国的危亡。

在日本，有保皇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办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猛烈抨击慈禧的黑暗朝政，继续宣传保皇立宪的改良思想；也有中国旅日留学生和流亡者出版的《开智录》、《译书汇编》、《国民报》、《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等，高扬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旗帜，对封建专制政治进行激烈批判。他们或要求人权、崇尚自由，或重视科学教育、反对封建礼教，或提倡男女平等、主张妇女解放，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组织兴中会，由于最初把主要力量都放在武装起义上，直到1900年1月才在香港创办第一份机关刊物《中国日报》。同时在国内秘密印发宣传小册子，其中邹容的《革命军》和陈天华的《猛回头》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在上海和杭州等地相继有《大陆》、《国民日报》、《警钟日报》等革命报刊问世。为了通俗宣传革命主张，还出现了《中国白话报》、《杭州白话报》，以及宣传妇女解放的《女子世界》、《中国女报》等。上海一家原来偏于保守的《苏报》，此时也转而宣传革命，并因发表介绍邹容《革命军》的文章及章太炎为该书所写的序言，而遭反动势力镇压，造成了震动一时的“苏报案”。

最著名的革命派报刊是1905年11月在日本东京出版的《民报》，它是同盟会的机关报，由陈天华、朱执信、胡汉民、章太炎等人先后任主编。孙中山为《民报》撰写发刊辞，首次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即三民主义。此后《民报》始终以三民主义为主要宣传内容，并于1906年领导了对改良派的报刊大论战。《民报》与改良派的主要喉舌《新民丛报》是双方论战的主要阵地，双方的20多种报刊全部投入论战。论战的主要问题是走革命的道路还是走改良的道路，建立民主共和国还是实行君主立宪制，以及要不要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实行土地国有等等。这场论战最后以《新民丛报》于1907年7月被迫停刊宣告了保皇派的失败，民主革命思想得到广泛传播，为辛亥革命作了思想和舆论上的准备。在论战的影响下，革命报刊发展很快，由论战前刊物不到30家、报纸仅10多家，增至40多家刊物和60多种报纸，有力地推动了革命运动的发展。

面对日益高涨的革命热潮，预感到灭亡的反动封建势力企图垂死挣扎。他们一方面疯狂镇压各地的武装起义，一方面更加严厉的查禁革命书刊。1906年7月，清政府颁布《大清印刷物专律》，同年又由巡警部拟订《报章应守规则》，次年12月再颁发《大清报律》，报业受到严格控制与摧残。但是革命大势已不可阻挡，在武昌起义燃起的燎原烈火中，腐朽的清政府及其对报业的禁锢一起覆灭了。

辛亥革命的胜利结束了封建专制统治，报界也解除了文禁，得到自由发展，出现了继戊戌维新之后的又一次办报高潮。在武昌起义后的半年里，全国报纸猛增至近500家，总销售量达4200万份，这两个数字都创历史最高记录。这段时间被称为报界的黄金时代。

然而随着袁世凯的上台和“二次革命”的失败，辛亥革命取得的成果彻底丧失，历史进入袁世凯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时期。报界又一次遭受严密控制和疯狂镇压。国民党及其有关的报刊几乎全被查封，各地封闭报馆、迫害报人的事件时有发生。袁世凯还制订并颁布了

《出版法》，用法律条文和暴力手段来限制言论出版自由。同时他又用金钱收买舆论，创办御用报纸。在他独裁统治时期内，御用报纸和黄色小报得以大肆泛滥，而进步报刊则遭到野蛮摧残。据调查统计，全国报纸至少有 71 家被查封，49 家受传讯，9 家被军警捣毁，新闻记者至少有 24 人被杀，60 人被捕入狱。袁世凯统治时期成为报业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辛亥革命后的报纸，在民国之初虽然繁荣了一时，但其精神实质却远不及清末。究其原因，还是由于思想认识的局限。待到袁世凯卷起的那股逆流弥漫乃至主宰了中国，曾使资产阶级革命派陶醉的革命成果被吞噬殆尽的时候，严峻的现实才促使人们认真思索。革命家们也曾重新进行“二次革命”，但是武装斗争迭遭失败，文化思想战线的斗争也显得缺乏声势和力量，报业出现的低潮就是这种现实的反映。北洋军阀中的皖系、直系、奉系相继执政后，政局更加动荡多变，报业的命运也愈发复杂艰辛。前途似乎一片渺茫。

但是历史不会期待太久，当“五四运动”如狂风暴雨般到来的时候，历史将翻开新的一页。中国的报业也将以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为标志，为近代报业划上一个完满的句号。

四

报刊的作用是通过报刊文来实现的，中国近代报刊的性质与特点决定着近代报刊文的内容与形式。由于我国近代报刊是启蒙运动的产物，担负着传播启蒙思想、唤醒民众、为政治运动制造舆论的任务，因此，鲜明的政治色彩及其启蒙教化作用是这一时期报刊文最突出的特点，政论文则成为最重要的一种报刊文章样式，并以其鲜明的启蒙思想倾向，出色的说理论辩能力，发挥着很好的宣传教育作用，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些报刊政论文是中国启蒙先驱者们的沉思与呐喊，它激昂悲壮而又深沉，充满对历史的思

考、对现实的焦虑以及对未来的希冀与渴望。在中国封建王朝彻底崩溃的前夜，在那个前进与倒退、光明与黑暗、希望与失望交织的时代，这些启蒙先驱者们呼喊出民族救亡、爱国图强的时代最强音，将中国人民从备受屈辱、民族危亡的境地中唤醒，从而开始了一场持久而悲壮的救亡运动。这种积极的思想意义，即使在今天仍然给予我们许多深刻的启迪与思索，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循环日报》是国人创办的最早报刊之一，它的创办人王韬在报上发表的《变法》、《尚简》等政论文，提倡学习西方，宣传政治改革，主张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是维新运动的先声。戊戌维新运动期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有关变法维新的思想主张借助报刊上发表的大量政论文得到广泛传播。其中《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变法通议》、《论中国之将强》等重要政论，有力地推动了初期的启蒙运动，促进了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热潮的形成。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辛亥革命时期利用报刊政论文所宣传的启蒙思想主要表现在对封建专制政治的激烈批判，要求人权与崇尚自由；提倡伦理、革命道德，反对封建纲常；提倡男女平等，主张妇女解放；鼓吹启发民智，重视科学教育等几个方面，包括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全部内容，使革命思想深入人心，得到普及，为辛亥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近代报刊文章的价值，除了其鲜明深刻的启蒙思想内涵之外，还以其对现实生活中的重要事件能够作出快速反应的时效性而显示出它独特的新闻价值，这是报刊文基本而普遍的一种特点。

近代许多报社非常注重对新闻消息的报道，在全国各地的主要城市派驻记者，以便对当地的新闻作出及时报道。消息、通讯、特写等新闻文体是报刊文中的一个重要类别，在报刊中占有较大篇幅。记者通过采访活动，对国内外发生的大事作出及时报道，并利用电报、电话等当时最先进的传输手段，迅速将消息传回报社，保证了新闻的时

效性，因此可以收到很好的宣传效果。消息、通讯、特写这些文体，由于以对事实的如实报道为原则，内容充实具体，观察冷静客观，显得真实可信。重大的事件往往会成为报道的热点，记者从多方面进行采访，作出连续报道，可以提供最丰富的材料，便于了解事实真相。例如 1883 年中法战争期间，《申报》以《战地通讯》为题，对法军不断制造事端挑起战争，以及中国军队抗击法军的情形，进行实地采访，连续报道，使全国人民及时了解战况，为掀起全面抗战热潮，在舆论宣传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又如《豫行日记》对河南灾民惨状的描述、民立报《武汉革命大风云》对武昌起义经过的客观报道，都突出地体现了这种特点。

报刊文的这种记实性，由于注重对事实真相的报道，大量保留了当时的原始材料，因而又具有史料价值，成为后人研究当时历史情况的珍贵材料。

近代的许多记者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一定的新闻学修养和办报经验，又有较好的中西学基础和驾驭文字的能力，具有新闻记者的敏感与判断力，所写通讯事实准确，报道及时，分析很有见地，他们的采写实践更使报刊文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活跃在辛亥革命时期的黄远生、刘少少、徐彬彬，以及稍后的邵飘萍、林白水、张季鸾、胡政之等人，都是当时引人注目的著名记者。他们所写的报道，标志着近代报刊文的成就和水平。其中如黄远生《借款内脉之解剖》对帝国主义借款活动的分析、邵飘萍《北京特别通讯》对北洋政府时期议会内幕的揭露，不但得到读者的欢迎和肯定，而且因其见解的精辟，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参考。

有些被报道的事件虽然并非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事件，但属于奇闻逸事，例如《申报》关于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杨乃武冤案的连续报道，也有一定新闻价值，而且受到读者的欢迎。

报刊文就其内容和作用而言，不外乎记录事实，传播思想，制造